

※專題演講※

歐洲的日本漢學研究現狀與課題

范德望* 著 張文朝** 譯

一、漢文學與漢學的定義：廣義的漢學及狹義的漢學

(一) 現代的定義：Sinology (漢學) 及 Chinese Studies (中國研究)

這是指在世界各國之中國文化和中國語的學術性研究，只是其中有開始的早晚之別，特別是在日本和韓國，此種傳統發展之早更是不用說。漢學及中國研究是一種隨著近代科學、學術的發達而形成的學問，除了文獻學、宗教學、歷史學、文學史之外，也採用了社會學等方法而發展起來。現在主要是指在大學這個特定組織範圍內所做的研究活動而言，不限於文字文化或精英文化，也包括庶民文化、風俗等。現在的中國學是指以中國一切的人文、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學問。

(二) 傳統的學問：

這是指直到現在仍然與中華文化保持深遠文化史關係的各國的傳統學問。雖然以前是相對於中國國內的自我文化而衍生形成的學問，但是以中國古典為中心，從事訓詁學以及中國文字文化、精英文化、中央文化等的學術性研究，也在中國周邊各國盛行著。江戶時代的儒家、文人文化等是屬於這一類傳統的學問。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假想有一種中華文化圈，或者漢字文化圈，或者東亞文明的連綿不斷地存在。中國人喜歡使用這種意義的漢學。這樣可以解釋為：由於強調中華文化的國際性與普遍性，日本與韓國被視為是這個國際輪廓（中華文化）

本文為范德望先生 2008 年 3 月 27 日於本所舉辦的「儒家經典之形成」學術座談會之講稿。

* 范德望 (W. F. Vande Walle)，比利時魯汶大學文學部東方學與斯拉夫學系教授。

** 張文朝，日本九州大學中國哲學史研究所博士。

的周邊國，所以日本與韓國的學問、學術文化，或者精英文化的絕大部分都是中國文化的一種具體呈現。

（三）更強調固有性、創造性的定義：

至於日本，雖然立足於中國的精英文化，卻又是獨自發展的文字文化。例如室町時代的五山文學、江戶時代的儒家、文人文化等都是。這並不屬於中國文化，而是在日本文化範疇內的精英文化的一種表現。包括由日本人用熟練的漢文所執筆、編輯、撰述、刊行的書籍、文書。

經常有人指出漢文與歐洲中世和近世的拉丁語的功能相類似，歐洲拉丁語學術文化、宗教文化也顯示了與羅馬帝國時代文化不同的獨特發展。同樣地，從這些日本文化遺產中，可以看出十分具有獨特性的東西。

我個人想把（一）稱為中國學或是中國研究，把（二）稱為在日本的漢學，把（三）稱為日本漢文學。在（二）與（三）的領域之研究，也許最好稱之為在日本的漢學研究、日本漢文學研究。

二、歐洲的日本漢學特色

（從與北美的日本漢學研究作對比來看）

眾所周知，北美與歐洲的日本學會有著密切的相互關係。到底是要把歐美各國看成一體呢？還是要個別看待歐洲與北美呢？這個問題暫且擱置不談。如果要勉強說它們之間有什麼不同的話，我想應該可以說是北美重視理論，而歐洲注重文獻學的考證吧！歐洲的學者充分地參考北美的日本漢學研究；但是相反地，北美的專家是否充分地參考歐洲的研究成果，則是很令人懷疑的。北美的學者中，也有除了英語以外的論文一概不參考的傾向，但是像寫了德川時代初期思想史這般堂堂大作的比利時人 Herman Ooms 則不在此限。Herman Ooms 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性人物。

Herman Ooms, *Tokugawa Ideology: Early Constructs, 1570-168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這是一本在日本漢學界評價很高的研究著作。

三、歐洲的日本漢學特色 (從與中國或臺灣的日本漢學研究作對比來看)

戰後，中國或臺灣的漢學特色在於以總論、通史、比較文化論為重點，進而由中華文化本位主義，或者是「起源論」的研究方法，取得領導的地位。特別是在初期，可以說那是很顯著的傾向。

比如說，梁容若著《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影響》(1953)，或是梁容若著《中國文化東漸研究》(1956)，就是很典型的題名。就某種意義而言，似乎易令人有日本學與日本漢學的研究是完全重疊的看法。梁容若〈唐祕書監兆(阿倍仲麻呂)事輯〉(收入劉百閔編《中日文化論集》[1955])也是這類的一個例子。但是從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特別是在臺灣的學界，似乎起了很大的變化。從戴瑞坤的《陽明學說對日本之影響》(1981)到劉梅琴的《山鹿素行》(1990)的變遷，可以得知，這種逐漸轉向日本本位與以人物為對象的研究傾向。

根據徐興慶先生的研究結果，從戰後到連同他所著的《新訂朱舜水集補遺》(2004)算起來，在臺灣方面出版了關於日本漢文學的學術專書約有三十五種。市面上販賣關於日本漢文學的翻譯書共有二十六種。由於後者是以中國經學為中心的日本中國學者所寫的學術論文，所以如果從西洋日本學者的觀點來看，這也許不算是日本漢學的範疇。

在歐美，關於日本漢學的整體性、綜合性的研究，數量並不多。在科學史或學術史的研究方面，雖然有一些，但是很多都是動不動就以洋學的觀點來研究，頗有輕視漢學及其相關事務之嫌。但不管如何，一提到日本漢學，可以說是以思想史的研究為主流。使用漢籍或漢文資料的學者，大抵都專攻思想史。上述所說的日本漢學，似乎並不令人那麼強烈地意識到這就是所謂的漢學，反倒令人覺得是在描述思想史。換句話說，從中國的觀點來看的話，把日本的漢學完全視為中國文化的一種變化的傾向，是很強烈的。而相對於此的歐洲，則大多數是從日本本位進行研究。如果確認了 Klaus Kracht 所編修的 *Japanese Thought in the Tokugawa Era: A Bibliography of Western-Language Material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1) 書中收錄了這類論題或書目的學術論文內容的話，大概就會同意我的說法了吧！

歐洲的日本漢學研究還有一個很顯著的特徵，那就是他們傾向於研究個別思想

家的傳記、思想，進而翻譯、注釋那些思想家的著作。我想其理由是受歐洲傳統文獻學的影響；而且由於綜合性的研究須以涉獵廣泛的文獻為前提，因此事實上是很困難的，我想這點也有必要加以考慮。林羅山、伊藤仁齋及荻生徂徠是最受矚目的日本漢學者。從近年來的論文或書評來看，上述的傾向相當明顯。

我想在這裏舉江戶初期為例，這就是 Joseph John Spae, *Itô Jinsai: A Philosopher, Educator and Sinologist of the Tokugawa Period,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12* (Peiping: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1948)。Spae 在戰前曾住過中國，是比利時出身的傳教士，精通日語、中國語，以及歐洲各國語言，因為這樣的背景，使他得涉獵、參考多種資料，戰後不久所發表的多數研究，都是根據 Spae 的成果而來，甚至超越他，進而取得對伊藤仁齋更深入的理解，這是理所當然的趨勢吧！

目前以德川時代儒學（新儒學＝朱子學）為研究中心，而活躍於學界的思想史家有萊登 (Leiden) 大學日本學科的 Willem Jan Boot 教授與牛津 (Oxford) 大學的 James McMullen 教授。這兩位教授都是根據嚴謹的文獻學來研究思想史。另外，他們時而也都對北美方面所提出與儒教思想有關的學術論文，持以嚴厲的批評態度，同時也寫了很多書評。這兩位教授的主要論文如下：

Willem Jan Boot, "Hayashi Razan as a Confucian Philosopher," in *European Studies on Japan*, ed. Ian Nish & Charles Dunn (Tenterden, Kent: Norbury Publications, 1979).

Willem Jan Boot, "The Adoption and Adaptation of Neo-Confucianism in Japan: The Role of Fujiwara Seika and Hayashi Razan" (Ph.D. diss., Leiden University, 1983).

Willem Jan Boot, "Shunmu-ki and Denchu Mondo: Two Instances of Buddhist-Confucian Polemics in the Edo Period," in *Conflict and Accommodation in Early Modern East Asia*, ed. Leonard Blussé & Harriet T. Zurndorfer (Leiden: E. J. Brill, 1993).

他的主要書評，羅列如下：

Willem Jan Boot, review of Janine Anderson Sawada's *Confucian Values and Popular Zen: Sekimon Shingaku in Eighteenth Century Jap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i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1.1 (1995): 214-219.

Willem Jan Boot, review of Yasunaga Toshinobu's *Ando Shoeki: Social and Ecological Philosopher of Eighteenth-Century Japan* (New York: Weatherhill, 1992), i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1.1 (1995): 219-222.

Willem Jan Boot, review of Samuel Hideo Yamashita's *Master Sorai's Respons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Sorai Sensei Tōmonsh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in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22.2 (1996): 430-435.

Willem Jan Boot, “Approaches to Ogyu Sorai: Translation and Transculturalization,” in *Monumenta Nipponica* 54.2 (1999): 247-258.

Willem Jan Boot, review of Mark Setton’s *Chong Yagyong: Korea’s Challenge to Orthodox Neo-Confucianism*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in *T’oung Pao* 85 (1999): 523-527.

Willem Jan Boot, review of Wai-ming Ng’s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 Asian Interactions and Comparisons* (Honolulu: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d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in *Monumenta Nipponica* 55.4 (2000): 606-609.

James McMullen 的論文如下：

James McMullen, *Idealism, Protest, and the Tale of Genji: The Confucianism of Kumazawa Banzan (1619-9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ames McMullen, “Ogyu Sorai and the Definition of Terms,” *Japan Forum* 13.2 (September, 2001).

還有，他們所廣泛採用的一本日本宗教的共同著作也應該提出來：

Peter F. Kornicki and James McMullen, *Religion in Japan: Arrows to Heaven and Ear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再者，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的名譽教授 Olof G. Lidin 的研究也幾乎皆以荻生徂徠為主。

Olof G. Lidin, trans., *Distinguishing the Way (Bendō)*, *Monumenta Nipponica Monographs* (Tokyo: Sophia University, 1970).

Olof G. Lidin, *The Life of Ogyū Sorai, a Tokugawa Confucian Philosopher* (Lund: Studentlitteratur, 1973).

Olof G. Lidin, *Ogyū Sorai’s Journey to Kai in 1706*,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48 (London: Curzon Press, 1983).

Olof G. Lidin, trans., *Ogyū Sorai’s Discourse on Government (Seida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9).

在法語圈方面，Olivier Ansart, *L'empire du rite: La pensée politique d'Ogyû Sorai, Japon 1666-1728* (Genève: Droz, 1998) 是值得注意的著作。Ansart 為瑞士的日本學者，致力於分析荻生徂徠的思想及其與歐洲政治理念的比較。

在德語圈方面，以仁齋及徂徠為題的研究中，我想舉出：柏林洪堡大學 (Humboldt-Universität) 的 Gerhard Leinss, *Japanische Anthropologie: Die Natur des Menschen in der konfuzianischen Neoklassik am Angang des 18. Jahrhunderts, Jinsai und Sorai*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5).

雖然山鹿素行受歡迎的程度越來越低，但也有一些關於他的翻譯、注釋或研究。前述的德國學者 Gerhard Leinss 所翻譯的《聖教要錄》就是一例。Sokôs Yamaga, "Kompendium der Weisenlehre" (Seikyôyorôku). *Ein Wörterbuch des neoklassischen Konfuzianismus im Japan des 17. Jahrhundert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9).

以時代性而言，正因為德川時代被視為儒學最興盛的時期，所以也是最常被研究的時代。一般認為上述西洋學者對這些德川時代思想家的注意，其背後深受丸山真男所遺留下來的研究成果之影響。自從丸山真男的德川時代思想史研究 *Studies in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okugawa Japan*, trans. Mikiso Hane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74) 被英譯出版以來，在北美或西歐都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甚至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丸山研究的熱潮。代表性的研究有德國海德堡 (Heidelberg) 大學日本學科的 Wolfgang Schamoni 及 Wolfgang Seifert 兩位教授的著作。

Masao Maruyama, Wolfgang Schamoni und Wolfgang Seifert, *Denken in Japa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Masao Maruyama, Wolfgang Schamoni und Wolfgang Seifert, *Loyalität und Rebellion* (München: Iudicium, 1996).

四、日本人的漢詩與漢文學

日本漢詩文學的歷史可追溯自奈良時代的《懷風藻》詩集 (751)，因其為平安時代宮廷文學的一環，而盛行於當時；進而在鎌倉、室町時代的五山禪林文學，及江戶時代儒者所謂文人文學的脈絡中，其質量都達到很高的程度。再者，在平安時代的物語文學方面，雖說是以和文寫成的，但卻帶有濃厚的中國文學風味。平安朝物語的成立、發展，與漢文學有很深且密不可分的關聯性，如果抽掉這關聯性，就

沒辦法談下去了。日本最古的漢詩集《懷風藻》作於七五一年，收錄了從七世紀後半到八世紀由六十四名作者所詠的一百一十六首漢詩。有人說以初唐詩為典範，新體詩的形態占大半的這部詩集，還有其不成熟之處，模仿的作品很多。但是，因為它是日本漢文學史中黎明期的遺產，所以是非常有價值的著作。最近歐洲學者終於也開始重視此書，義大利的東方學重鎮拿坡里大學出版了一本專書：

Andrea Maurizi, *Il più antico testo poetico del Giappone: il Kaifūsō (Raccolta in onore di antichi poeti)* (Pisa: 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 2002).

九世紀初，從遷都到平安京之後，以嵯峨天皇的治世為起點，漢詩文學迎接了一個全盛的時期，在這期間完成了三部敕撰漢詩集。詩人可以自由自在地使用漢詩中的各種形式，特別是空海與菅原道真的詩作，更是在日本漢詩文學史中，劃下絢爛的一頁。

另外，平安朝文學的特徵之一，是和歌與漢詩並存併用，但兩者卻有所區分。這創造出極其獨特的文學作風，同時也決定了後世日本文學的步調。典型的例子就是《和漢朗詠集》。對這兩種詩歌感興趣的學者還很少，但是萊登大學 Ivo B. Smits 則以此為他的研究領域。他的主要研究如下：

Ivo B. Smits, *The Pursuit of Loneliness: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ure Poetry in Medieval Japan, ca. 1050-1150*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1995) (他的博士論文)。

關於平安末期的漢詩人與白樂天的關係，我想舉出下列的論文：

Ivo B. Smits, "Reading the New Ballads: Late Heian kanshi Poets and Bo Juyi," in *Wasser-Spuren: Festschrift für Wolfram Naumann zum 65. Geburtstag*, ed. Stanca Scholz-Cionc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7).

他並以由美國的日本文學與中國文學專家英譯出版的《和漢朗詠集》為契機，就《和漢朗詠集》發表了兼有書評的詳細論文：

Ivo B. Smits, "Song as Cultural History: Reading Wakan rōeishū (Interpretations)," *Monumenta Nipponica* 55.3 (2000): 399-427.

Ivo B. Smits, "Song as Cultural History: Reading Wakan rōeishū (Texts)," *Monumenta Nipponica* 55.2 (2000): 225-256.

還有，容我再介紹一下，他最近發表的兩篇這類的論文：

Ivo B. Smits, "China as Classic Text: Chinese Books and Twelfth Century Japanese Collectors," in *Tools of Culture: Japan's Cultural, Intellectual, Medical, and*

Technological Contacts in East Asia, 1000-1500s, ed. Andrew Goble, Kenneth Robinson and Haruko Wakabayashi (Ann Arbor, Mich.: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9).

Ivo B. Smits, "The Way of the Literati: Chinese Learning and Literary Practice in Mid-Heian Japan," in *Heian Japan, Centers and Peripheries*, ed. Mikael S. Adolphson and Edward Kamen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而活躍於同一研究領域的法國學者中，首先要舉出的是 Michel Viellard-Baron：

Michel Viellard-Baron, "Les métamorphoses du mot: La citation de vers chinois comme sujet de composition de poèmes japonais, Waka,"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7 (1995): 67-90.

五山文學、江戶漢詩文學方面：

在北美方面有 Timothy Bradstock and Judith N. Rabinovitch, *An Anthology of Kanshi (Chinese Verse) by Japanese Poets of the Edo Period (1603-1868)*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1997)。而歐洲方面則很少有值得一提的。俄羅斯聖彼得堡 (Saint-Petersburg) 大學的 Alexander Khabanoff 則有五山文學漢詩的研究。

五、佛學、日本佛教的研究

以禪宗為首的佛教各宗派的研究中，使用漢文資料為前提的研究題目很多，研究者人數也很多，在此無法一一羅列。由於佛學是歐洲學界長期以來已扎下深根的領域，因此研究者的層次相當厚實。比利時的佛教學者 Etienne Lamotte 的力作，法語全譯注釋《羅什漢譯大智度論》，正是說明佛學研究水準之高的一個例子吧！

在法國學者中，研究天台宗教義的 Jean-Noël Robert 以研究漢文佛典、論書為其重點。他的主要著作如下：

Jean-Noël Robert, *Les doctrines de l'école japonaise Tendai au début du IXe siècle: Gishin et le Hokke-shû gi shû*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1990).

這個著作曾得到一九八八年的「澀澤・克羅耐爾獎」(澁沢・クロデル賞)。還有，*Kumārajīva. Le Sûtra du Lotus; Suivi du Livre des sens innombrables et du Livre de la contemplation de Sare-Universel*, traduit du chinois par Jean-Noël Robert (Paris: Fayard, 1997)《羅什漢譯法華經》的法語譯本是他重要的翻譯成果。

最後，不能不提一下瑞士的法語圈出身的佛教學者，特別是研究禪林歷史及思想的 Michel Mohr 博士的大作：

Michel Mohr, *Traité sur l'inépuisable lampe du Zen: Torei (1721-1792) et sa vision de l'éveil* (Bruxelles: 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 1997).

六、日本的漢文教育史研究

在歐洲研究這類题目的學者只有德國出身，現任哥本哈根大學日本學教授的 Margaret Mehl 女士一人而已。

Margaret Dorothea Mehl, "Chinese Learning (kangaku) in Meiji Japan (1868-1912)," *History* 85 (2000): 48-66.

她在這篇論文中，探討了明治時代漢學塾短暫的隆盛背景與衰退的原因。一般的定論認為，日清戰爭日本戰勝，致使日本對中國的觀點急速產生變化是其主要原因，但是她認為其主因應該是在於教育改革，因為日本教育由漢學轉變為洋學之故。而我則認為這兩種原因並不一定不能相容。

以下的論文是她以同一個主題，聚焦於九州的兩個具體事例上所提出的：

Margaret Dorothea Mehl, "Private Lehrstätten für chinesische Studien (kangaku juku) in der Meiji-Zeit: Zwei Beispiele aus Kyushu," Barbara Manthey, Peter Kleinen et al., eds., *Japan Welten: Aspekte der deutschsprachigen Japanforschung* (Bonn: Bier, 2000).

順便一提的是，她雖然寫了下列有關歐美的日本漢學研究的短文，但似乎混淆了前述所說的三種（一）中國學或中國研究、（二）日本漢學、（三）日本漢文學的定義：

Margaret Dorothea Mehl, "Japanese Sinology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sletter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11.4 (2001): 203-205.

七、歐洲的大學漢文教育

在歐洲的日本學各科中，開設漢文入門講座的單位有限。我想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出現了用德語和法語寫成的漢文入門教科書。

在英語圈以前有 Imai 與 Rohlick 共同編輯的漢文入門書，在歐洲也有二、三種。在法國方面，Jean-Noël Robert 教授先後在巴黎大學、國立高等研究院宗教學部擔任以法國學生為對象的漢文入門講座。開設該講座已經過了二十年，他為了便於上課，所以很早就已編修了漢文入門教科書：

Jean-Noël Robert, *Lectures élémentaires en style sino-japonais (kanbun)* (Paris: Université de Paris 7, 1986).

而在德語圈方面：

柏林洪堡大學的 Astrid Brochlos, *Kanbun: Grundlagen der klassischen sino-japanischen Schriftsprach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04) 則是最近刊行的新教材。

上面所說的兩本書的書名所用的用語，也就是 *style sino-japonais (kanbun)* 與 *klassischen sino-japanischen Schriftsprache*，這些用語很難直譯，它是古典的、書寫的用語，類似日本所使用的中國字，這是希望大家能清楚地注意到它與中國漢文（古典中國語）的區別。

還有在海德堡大學有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inology: History, Resources, Texts* 的講座。授課者是 Prof. Joshua Foge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與 Prof. Barbara Mittler (Heidelber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這當是以該大學中國學科的學生為對象所開的關於日本中國學、日本中國研究的入門講座。

八、日本漢文學的文學性

日本漢文與中國漢文不同，外觀看起來好像是一樣，但實際上語言就是不同。我想連外觀都不一樣。日本的漢文、漢詩特性在於古典中國語和「書き下し」（依照日本語語順，訓讀漢文並夾雜假名來改寫漢文）並列、並存。它的表現方式有：白文（甚麼都沒加的漢文）、返點（訓讀漢文時為表示其讀法順序，在漢字左下所施的小符號，有「レ、一・二・三、上・中・下、甲・乙・丙、天・地・人」等）、「書き下し」、振り假名（在漢字旁注日語音）等，日本漢文的表現不是只有一種而已，而是擁有多樣的表象。同樣的漢文文章竟然使用兩種語言體系，可說是很獨特的形態。

九、日本漢文學研究的課題

最近與日本學相關的學會的預定計畫，很多都是與佛教、思想史、宗教有關。而與德川時代以前的漢文、漢詩，德川時代的文人文學，甚至明治時代的漢文、漢詩有關的論文卻很少。原本從日本漢學的角度來從事日本文化的研究就已經很少了，再加上以明治維新之後的漢學研究為重心的學者更是少之又少。

最後，我想提出以下各點作為今後研究的課題：

- (一) 從語言學史的觀點來研究漢文（包括訓讀的成立、變遷等）與和文的關係。
- (二) 五山文學：漢詩、詩論，以及與此有關的禪林抄物的研究。
- (三) 開發、製作變體漢文的教科書。